

黄泰岩 著

探求市场之路

中国学术前沿性论题文存

京华学人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探求市场 之路

黄泰岩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求市场之路/黄泰岩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1
(中国学术前沿性论文文存·京华学人卷)
ISBN 7-207-05179-4

I. 探… II. 黄… III. 市场经济—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F1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5823 号

责任编辑: 李 兵
封面设计: 于克广

探求市场之路

Tanqiu Shichang zhi lu
黄泰岩 著

出 版 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E-mail hljrmcbs@yeah. net
制 版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16.625·插页 2
字 数	402 000
印 数	1-2 0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5179-4/F·972

定价: 23.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总 序

中国的历史似乎越古越辉煌,雄汉盛唐、唐宗宋祖、秦皇汉武……一部中国古代史灿烂辉煌,让人留连忘返。然而,盛极而衰,这是一个古老而平凡的真理。历史的发展总是一条曲线而不是直线。一部中国近代史黑暗悲惨,让人不忍卒读,战祸离乱、割地赔款、百年凌辱……“长夜难明赤县天”。历史的这一页终于被翻过去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了一条现实的道路。然而,从 1957 年开始,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又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引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的现代化再次误入历史的沼泽地。感谢邓小平,正是他老人家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使“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奇迹般地走出了历史的沼泽地,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开辟了新的天地。

从 1978 年至今,短短的二十余年,在人类历史上只能是“弹指

一挥间”，然而，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却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单一的公有制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当代中国正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实现现代化，而这种市场化、现代化又是同社会主义改革密切相联甚至融为一体的。换言之，我们是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迁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的，从而构成了一次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这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迁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必然给当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及其学术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我始终认为，学术研究不能仅仅成为学者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成为学者个人的“自言自语”，学术研究应该也必须同现实“对话”，否则，学术研究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甚至是“无病呻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当代中国最基本的现实。关注这一现实，从总体上把握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由此引发对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思考，这是学者应有的良心和使命。在我看来，现实实践中的难点或“热点”问题与学术前沿性论题是密切相关甚至融为一体的，现实实践中的难点或“热点”问题必然构成学术前沿性论题，而真正的学术前沿性论题归根到底是现实实践中的难点或“热点”问题。二者的双向运动构成了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亮丽的风景线。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的学术研究日益贫困，甚至走向衰落。这是一种无原则的糊涂观念。市场经济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并非如同冰炭，难以相融。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也没有当代的

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当然,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前无古人的新的实践必然向人们提出新的问题,必然为学术研究开辟一个新的思维空间。事实也的确如此。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断拓展,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批判反思,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反思,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正日趋繁荣,走向成熟,从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

正因为如此,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委托,我主持编辑了这套“中国学术前沿性论题文存”(京华学人卷)。

首批列入这套丛书的有八部著作,即赵敦华教授的《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万俊人教授的《现代性的伦理话语》,杨慧林教授的《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黄泰岩教授的《探求市场之路》,朱勇教授的《中国法律的艰辛历程》,景天魁教授的《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李强教授的《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以及杨耕教授的《为马克思辩护》。

从这些著作的作者来看,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这是一个特殊的学术群体,他们基本上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上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个“解冻”的年代走进大学校园,尔后又取得博士学位,被评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们都经历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天灾人祸”,而他们的学术生涯又是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联系在一起的,几乎是同步进行。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使这些作者对社会与人生有了深刻的体认,并对他们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这些著作的内容看,它们分别涉及到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显示出不同的理论视角和不同的理论主

题。这些著作或者直接从现实出发去描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或者似乎在进行纯学术研究而实际上在间接地探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或者纵目远眺,通过对理论本身的批判反思回归现实,从而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每一个心灵都有它的望远镜”(狄德罗)。作者们在平凡的生活中深入掘进,在学术研究中深刻反思,从而将理论触角伸到了现实深处,同时,又保持了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反思性和批判性。

我不能说这些著作已达到高屋建瓴,但它们也绝不是浅滩上的漫步。这里,对大变革的礼赞和对旧体制的否定融为一体,真实的描述和理论的反思融为一体。你可以不同意作者的结论,但你不能不敬佩作者在如此广泛的领域里所进行的认真探索;你可以不欣赏这幅画面,但它的斑斓五彩不能不在这一方面或那一点上激起你探索的激情。

在我看来,这些著作既无压倒千古大哲的虚骄之气,也无一味取悦于读者的卑贱之心,相反,它们只是作者们二十年来上下求索的结果,是他们学术研究的心灵写照和诚实记录。“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及其学术研究的确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丝毫不否认这套丛书存在着缺陷、成见或错误。“学者们固然有时比一般人的成见少,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已有的成见坚持的比一般人更厉害。”(卢梭)因而,对于学者来说,随时准备抛弃成见、修正错误尤为重要。在学术研究中,我们仍将“执著”,即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但不“固执”,即拘泥于成见或错误。只有当我们将对错误的错误理解中摆脱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以合乎真理的方式去谈论真理。因此,我们欢迎一切批评,而不管这种批评是出自善意还是来自恶意。

但是,我们达不到这样一种要求,即“完善”。在我看来,追求完善,这是学者的品格;要求完善,则是对学者的刻薄。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分的要求。“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马克思)因此,向学者以至任何人要求完善,实际上是向他索取生命。

杨 耕

2001 年 11 月于北京西山

导论 中国经济学的历史 转折与发展思路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如何立足于具有特殊性和历史性的中国现实土壤上,研究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从而在解决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诸多难题的同时,在经济学发展的世界文明大道上,建立和发展独具特色的中国经济学,促进市场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和繁荣,成为每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经济学人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与面临的困惑

近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代人的艰辛探索,中国经济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取得了相当

丰硕的成果。可以说,中国经济学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回顾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有三条研究的基本脉络:(1)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大批的经济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认识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从而奠定了中国经济学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2)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大门的开启,大批的经济学者通过各种形式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经济学,特别是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经济学,形成了开放性的经济理论,从而奠定了中国经济学坚实的世界文明基础。(3)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实践的理论化。随着几代人对中国富民强国梦的追寻,特别是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轨,以及现代化建设的大规模全面展开,大批的经济学者侧重立足于中国的现实,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制度变迁中,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实证分析、案例解析的基础上,通过归纳、总结、提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从而奠定了中国经济学坚实的实践基础。

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虽然这三条基本的研究脉络并不是截然分开、对立的,而是在相互交融中各有所侧重,但它们的发展并不是平行向前推进的。总体来说,前两个研究脉络在我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而第三个研究脉络的发展则相对滞后。中国经济学研究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就造成了中国经济学发展中的如下困惑:

(1)规范研究的困惑。规范研究方法的运用,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形成一套严格的规范标准,但在对中国实践缺

乏归纳、总结、提升,尚未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框架和规范标准的情况下,规范研究将无从展开。脱离开中国国情的任何别的理论框架和规范标准,即使在它的出生地运用得再成功,也只能作为我国的参照标准,而不可能作为规范标准。虽然市场经济具有一般的理论和规范,但这种一般性的理论和规范,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初期具有意义,当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进入深层次的运作时就难以用来指导实践。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当务之急是通过对中国实践的归纳、总结、提升,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框架和规范标准,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学进入了一个需要建立新规范的时代。

(2)比较研究的困惑。引进和介绍国外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在日趋减弱。这突出地表现在:虽然把国外的许多理论和成功的经验引进来,但在我国却并未获得应有的成功,而在国外认为是不规范的做法,在我国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实际上就是水土不服。可以说,简单地引进,已走到了尽头。我们提倡大规模的引进,今后还应该继续引进,但经过多年的大规模引进后中国经济学应该做什么?是到了该思考的时候了。引进技术,我国一直强调消化、吸收、创新。引进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同样也要强调消化、吸收、创新,而且不仅要有模仿创新,更要有自主创新。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学在经历了大引进后应及时向理论创新转变。

(3)理论联系实际研究的困惑。理论联系实际是我国一直推崇和需要发扬的学风,但在我国,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从而形成了一种尴尬局面:实际经济工作者对经济理论的饥渴和经济理论工作者对经济实践的饥渴。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一是在制度设定上造成了经济理论工作者与实际经

济工作者的隔离,二者缺乏相互沟通的渠道;二是对经济科学研究的误解,以为经济科学研究可以不需要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建立在大量的实验(经济科学研究表现为大规模的调查)基础上,从而在科研经费、研究方式、研究成果评定等方面扼杀了经济科学研究的实践性。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打通理论联系实际的渠道,进入二者紧密联系的新时代。否则,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将是无源之水。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已走到了新的历史转折点:这就是中国经济学必须从以往的理论传播、引进为主转向理论创新为主,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了经济理论创新的新时代。这里所说的理论创新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实践检验已有的理论;二是从实践中提升新的理论。检验理论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提升理论则是为了丰富和发展。

二、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动力与突破口

经济学发展的动力源既有外部动力,也有内在动力。外部动力主要来自于实践的需求,因为经济学是“致用之学”,是用来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当已有的经济理论已经落后于现实,从而不能有效地解释现实,并用之于改造现实的时候,经济理论的革命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经济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方法论的革命。从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一次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都会带来经济学突飞猛进的发展,如边际理论、信息论、博弈论等的出现,都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扩展了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二是对已有理论假定前提的修正,即通过修正已有理论的假定前提,扩展经济学研究领域,得出新的结论,

实现经济学的创新。对已有理论假定前提的修正更加强调从现实出发,即根据已经变化了的现实去修正不合现实的理论假定。例如,凯恩斯根据 1929~1933 年的经济大危机,否定了萨伊定律,提出了新的理论,创造了“凯恩斯革命”。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从外部动力来看,应该说是赶上了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因为一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式转轨在世界经济制度变迁史上是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二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三元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背景下要同时实现工业化、知识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这两个“独一无二”、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不可能有现成的理论来指导,而只能依靠创新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的巨大需求将成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强大外部动力。

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来看,将会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才刚刚开始,这种不成熟的实践不可能孕育出成熟的理论,因而中国经济学者要想在成熟的市场经济背景下生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中有所作为将是相当艰难的,这不是我们的无能,而是历史的局限。所以对中国经济学者来说,立足于中国经济实践的特殊性,探索市场经济一般在中国的变形,建立中国经济学,将是得天独厚的。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将主要不是表现为一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创新与革命,而主要表现为对市场经济理论基本假设前提的修正和补充。所以,我认为,在现阶段,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主要内在动力是对理论假定前提的修正和补充,即通过对理论假定前提的改变或补充,修正经济学已有的理论,得出新观点,创造新理论。这主要是指从实际经济问题中提炼出的理论。其基本机制是依据实际经济问题,

对已有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前提做出修正或扩展,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在新世纪,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进入新的转折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可以说,新的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迅速发展和勃兴的世纪。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将表现出以下两个基本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将出现“三合一”趋势。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会继续沿着以上三个基本脉络向前演进,但三者之间的相互融合将是中国经济学在新世纪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融合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是解决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的客观要求。同时,中国经济学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前提下,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了西方经济理论,植根于丰富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从而为这种融合奠定了现实可行的知识基础。这种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经济学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既要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也要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最新的发展进程,同时,还要了解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情况,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人才的基础和可行的知识基础。从“三合一”的趋势来说,从现实中提炼理论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国化,还是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都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否则,就会使在原有的理论假定前提下是正确的理论,变成教条,走向误区,这是不利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的。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将出现从现实提炼理论的主流趋势。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将是新世纪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这是因为:

(1)面对新的现实,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不是现成的教条,不是让人们背诵的教义,她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自于丰富的社会经济实践,而社会经济实践却是不断变化、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必须根据社会经济实践的变化而不断修改、补充、完善和发展,使其适应和解释变化了的实践。这具体表现在:一是要用社会经济实践来检验已有的经济理论,对于那些被实践证明已经过时的个别结论要敢于大胆地放弃。二是要根据新的社会经济实践经验和变化了的具体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供的科学方法,对实际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创立新的理论和观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这一历史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中国经济学者的肩上。这就要用中国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2)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现实之间的矛盾。西方经济理论是在西方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来说,虽然存在市场经济一般的一面,但也不可否认存在矛盾的一面。这是因为,西方经济理论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背景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经济制度不同。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实现共同富裕;而西方实行的市场经济则是以私有制为前提。因此,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就面临着以下两个矛盾:一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即在缩小国有经济比例以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通过加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来保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二是共同富裕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即在建立市场分配收入制度,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如何通过政府的合理干预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因为单纯的市场分配收入制度必然导

致居民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如果出现两极分化,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也就失败了。②基本国情不同。首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其面临的基本任务是要发挥后发优势,以便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知识化,赶超发达国家。其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地域和人口大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各方面的矛盾相互交织是其一个重要的特征。再次,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轨阶段,市场发育不良,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是其基本特征,转轨的渐进性又决定了中国的市场化将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最后,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可抗拒,使中国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基本国情与西方的根本性差异,就使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现实会发生矛盾和冲突。③社会文化传统不同。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但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却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样,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必然会不同于西方,如现代企业制度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就很难找到典型的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因此,在东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差异的情况下,如果简单地移植,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可能会水土不服。以上所说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展中的大国、渐进式的经济转轨、特殊的社会文化传统等等的现实集合,造成了中国经济现实与西方经济理论假定前提的严重错位,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不能靠简单地移植来建立,而需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吸收、改造西方的经济理论。

(3)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需要。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是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伟大实践,这场全新的伟大实践所提出来的全新课题如所有制结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收入分配制

度、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以及中国的三元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结构调整等问题都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和指导。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理论落后于经济实践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实践的扩展和深化。但是,这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当中还可以理解,因为改革尚处在摸索期。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框架初步建立、市场经济在中国经过长期的实践已达到足够积累的今天,理论再继续落后于实践已失去了理由。因此,从实践中提升理论,已成为当今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最为迫切和关键的问题。幸好这场全新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和肥沃的土壤,这是这一代中国经济学者的荣幸和福分。伟大的实践必将产生出伟大的理论和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必将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三、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突破路径

基于以上认识,要推进经济学的中国化,建立中国经济学,就必须要实现以下三个突破:

(1)研究方法的突破。在研究方法上,要突破两个教条:即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地对待西方经济学。两个教条的共同特点是用已有理论去衡量现实,然后让现实服从于已有的理论。例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不能教条主义地将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简单移植过来,然后和中国的企业制度做一简单对比,指出中国企业制度存在的不足,最后提出政策建议。因为前面提过,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形或变异,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